

開眼看世界 與孫中山 1885 年決志“創建民國”

彭 劍

[提 要] 孫中山回首往事時,自稱在 1885 年決志革命,以“創建民國”為目標。對此,很多學者持否定態度。實則孫中山在此時提出“創建民國”,既有思想基礎,也有社會條件。思想基礎方面,孫中山 13 歲前往檀香山,在課堂內外,接受了共和觀念的影響。在社會條件方面,從鴉片戰爭起,國人中便有人介紹美國、法國等共和國的信息,並且,有些著作在介紹共和國相關制度時,充滿了欣賞之情。這種傳播,構成了主張創建共和國的革命派興起的基礎。實證不是死摳文字,而當揆諸實情。不能因為孫中山在 1885 年以後多年中留下的文字都是關於改良的,而否定他在 1885 年決志革命。他沒有留下主張革命的文字,是出於自我保護;而留下主張改良的文字,最多也只是顯示其革命思想尚不堅定。

[關鍵詞] 共和革命 孫中山 開眼看世界 君主立憲 創建民國

[中圖分類號] K257.1 [文獻標識碼] A [文章編號] 0874 - 1824 (2026) 02 - 0168 - 09

孫中山曾自稱,他最早決志“傾覆清廷,創建民國”,是在 1885 年。然而自 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,一直有學者質疑這一說法。孫中山是中華民國最重要的創立者,而終結君主制、建立共和國,乃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“古今之變”。正因如此,孫中山在何時立志“創建民國”,就成為一個有持久學術價值的命題。

一、“始決”並非自說自話

在成書於 1919 年的《孫文學說》中,孫中山寫道:“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,始決傾覆清廷、創建民國之志。”^①此處所說的乙酉年,即 1885 年。那一年,孫中山實歲十九,虛歲二十。那一年,中法戰爭結束,中國在取得重大軍事勝利的情況下“乘勝即收”,最終形成“不敗而敗”的結局。孫中山自稱,受此時局刺激,他第一次決心“傾覆清廷,創建民國”。民國時期,無人質疑這一說法。但是,自 20 世紀 50 年代起,陸續有學者提出異議。^②大致而言,有全部否定與局部否定之別。一些學者認為,1885 年,孫中山既不可能決志“傾覆清廷”,也不可能決志“創建民國”;^③另一些學者則認為,決志“傾覆清廷”是可信的,而決志“創建民國”則不可信。^④

先辨析前一種主張。持此論者之所以認定孫中山在 1885 年不可能決志“傾覆清廷，創建民國”，主要依據有二：一是此說僅見於孫中山晚年回憶，缺乏同時代文獻佐證；二是此後數年間，孫氏所提出的救時方案，並未超出同時期洋務派、維新派的水平，仍然屬於改良範疇，如其 1890 年致鄭藻如信以及 1894 年《上李鴻章書》，均未見反清色彩。研究者因此強調，應依據歷史人物當時言行而非事後回憶立論。按此邏輯，迄至 1894 年，孫中山仍是一個改良主義者，所謂 1885 年就決志“傾覆清廷，創建民國”之說不可信。

應當承認，上述論證遵循了史學的實證原則，“一分材料出一分貨，十分材料出十分貨，沒有材料便不出貨”，體現了史學研究的嚴謹性。^⑤但是，如果將實證簡單等同於僅憑文字材料定是非，認為凡無文字記載者即未發生，或者反過來，將文字所呈現的均視為事實，則未免失之於膠柱鼓瑟，且嚴重錯解了“實證”的深層意涵。誠如有學者所指出的，利用日記等文獻進行研究有很大局限，因為歷史人物並不會將自己親歷親聞的所有事情都付諸筆墨。比如，一個政客若圖謀政變或暗殺政敵，就很有可能不會在日記中留下任何痕跡。^⑥這一見解無疑是深刻的。

刻意凸顯某些事情，對其大書特書，同時規避另外一些事情，使其不留下文字，這種情形，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。史學界熟知的“崔杼弑其君”即為一例。崔杼設計殺死齊莊公後，齊國太史記曰：“崔杼弑其君。”崔杼殺太史。太史的弟弟也堅持這麼寫，崔杼又殺之。太史的另一個弟弟還堅持這麼寫，崔杼才停止了殺人。這個故事一直以來被當作史家秉筆直書的典範，如果稍微轉換一下視角，正可見崔杼如何竭力避免此事被載入史冊。再如甲午戰爭期間，慈禧太后曾密召翁同龢至內廷，命他前往天津向李鴻章傳話，囑李與俄國公使接觸，請其調停中日衝突。慈禧特別強調，此事“不能書廷寄，不能發電旨”。^⑦也就是說，只能口頭傳達，不得留下任何文字。這是慈禧太后的算盤，但翁同龢在帝后黨爭中屬帝黨領袖，與后黨處於競爭地位，此事無損其自身形象，因此他將其寫入當天的日記。透過翁同龢的記載，我們才知道慈禧太后既想與日本媾和、又恐留下把柄的隱衷。由此可以合理推測，歷代“口傳聖諭”中，不知有多少類似的權謀算計未曾載諸簡冊。皇家之外，各級官紳乃至普通百姓之間，此類情形自然也不在少數。

在這種情形下，如果史學研究僅以文字材料為依據，凡無文字記載者便斷言不曾發生，那麼這種“實證”反而可能離歷史實際更遠，甚至越是強調“實證”，越容易偏離真相。以辛亥革命期間的袁世凱為例，他從未公開表示要推翻清廷，反而一再以清廷內閣總理大臣自居，聲稱要維護清室。如果有人僅憑其公開言論，便“實證”出他在辛亥革命中是清廷忠臣，豈非貽笑大方？青年孫中山決志“傾覆清廷，創建民國”，正屬於這種需要設身處地去理解的情形。1885 年，一個十九歲的青年萌生出如此激烈的反叛念頭，其內心一定經歷了翻江倒海般的波瀾。然而，這畢竟是他首次萌生如此大膽的想法，能否覓得同志，能否堅持到底，均屬未知；而謀叛朝廷是誅滅九族的大罪。在當時的情勢下，豈能奢望他在公私文獻中留下革命言論？在正式決裂之前，一個沉穩持重的革命者，絕不會輕易落下此類文字。

顯然，僅以文字為憑，算不得真正的實證。真正的實證，除對留存至今的文字史料詳加辨析外，更當設身處地，以理解古人“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”。^⑧就孫中山 1885 年決志革命一事而言，不能只考察他是不是留下了革命性的言論，更應考察他是否有“決志”革命的思想基礎，並從他此後的所作所為，反觀這一“決志”是否合乎事理。關於思想基礎，下文將詳論，此處先考察 1885 年之後孫中山的實際行動。據孫中山自述，“始決”之後，他“以學堂為鼓吹之地，借醫術為入世之媒”，並稱這一階段為“革命言論之時代”，即只有言論鼓吹，尚無武裝鬥爭。^⑨對此，有學者持懷疑態度。但

從歷史的進程來看，其憶述並非不可信。他在回憶中說，“始決”之後，他開始暗中有同學、朋友中鼓吹革命，其結果，誠如很多研究已經揭示的，是找到了陸皓東、鄭士良、楊鶴齡、陳少白、九列、楊衢雲等志同道合者。除楊鶴齡外，這些人後來都成為他建立革命組織、發動武裝起義、創辦革命報刊的重要支持者，^⑩且都加入了興中會。其中，陸皓東犧牲於 1895 年的廣州起義，鄭士良、楊衢雲亦參與該役，後於 1901 年殉難。這些事實，無疑說明孫中山的憶述具有相當的可信度。

至於陳少白，作為孫中山大學時代的同學與室友，不但一直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，晚年還留下了回憶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在回憶中不但提到了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期間（1887 年入學）“天天談革命”的情形，還提及孫中山曾在宿舍試製炸彈等事。^⑪孫中山的另一位大學同學關景良，曾接受歷史學家簡又文採訪，留下了一點回憶性文字。他不但憶述孫中山在校期間高談革命，還講述了一則趣事：有一次，孫中山到關家做客，關母問他：“你志高言大，想做什麼官——廣東制台嗎？”孫回答：“不！”“想做欽差嗎？”又答：“不！”“然則想做皇帝嗎？”孫中山回答道：“皆不想。我只想推翻滿洲政府，還我漢族山河，那事業比做皇帝更高更大了。”^⑫想推翻清廷，卻不想當皇帝，此中已隱約傳達出“共和革命”的信息。^⑬

如果說孫中山一個人的憶述不足為憑，那麼，他的兩位同學也在回憶中談到他在求學階段鼓吹革命的往事，加上他所提及的早年結識之人後來多成為其重要支持者，有理由認定，孫中山的這段憶述是基本可信的。而他在大學期間鼓吹革命的活動，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其 1885 年決志革命的可能性——畢竟，從 1885 年到他進入大學學習，只隔了兩年光景。

那麼，如何認識孫中山所撰《上李鴻章書》？對此，學界有兩種觀點，一種認為，這是孫中山革命意志不堅定、在革命與改良之間搖擺的表現；^⑭一種則認為，這是孫中山的革命策略，名為上書，實際上是刺探清廷虛實。^⑮這兩種見解都持之有故，但不論採信哪一種，都不影響本文的判斷。如果是“搖擺”，則說明孫中山在 1885 年決志革命之後，有時仍退回到改良立場；如果是“策略”，則說明孫中山在決志革命之後，其革命決心從無動搖。總之，從見之於行事的角度來看，雖然找不到孫中山 30 歲之前主張革命的文字，但他在 1885 年之後，確實已經在推動革命了。並且，他在校期間鼓吹革命一事，還有陳少白、關景良等同學的證言為據，並非只有他自己所提供的孤證。

二、孫中山決志“創建民國”的思想基礎

從以上所論，可知孫中山在 1885 年決志革命是可信的。問題在於，有學者雖然認可孫中山在 1885 年決志革命，卻並非全然接受，只認可孫決志“傾覆清廷”，不認可孫決志“創建民國”。因此，有必要對此作進一步辨析。

按照這些學者的論證，決志“傾覆清廷”之所以可信，是因為孫中山就讀私塾期間，其塾師的朋友中（或說其塾師中），有一位太平天國的老軍人，常來塾中講述太平天國的故事。幼年孫中山總是聽得入迷，因而被鄉人呼為“洪秀全”，而他自己也以“洪秀全第二”自居。^⑯由此看來，孫中山自幼便受到了反滿思想的薰陶，在心靈深處播下了一顆反滿的種子。^⑰這顆種子，一旦時機成熟，便會生根發芽，生長壯大。而中法戰爭，正是一個關鍵的觸發點。這場戰爭的結局使孫中山對清廷徹底絕望，從而決志“傾覆清廷”。也就是說，孫中山之所以決志“傾覆清廷”，既有思想基礎，也有現實觸媒，因而可信。

然而，學者們幾乎沒有論證孫中山是否具備決志“創建民國”的思想基礎。^⑱實際上，孫中山在這方面同樣不乏根基。其受“民國”即共和思想的薰陶，與接受洪楊革命的影響，相隔並不太久。

關於孫中山入私塾的時間，學界曾有分歧，陳錫祺綜合新舊文獻，斷定為 10 歲。^⑩也就是說，他接受太平天國革命的薰陶，是在 10 歲以後。但有一個事實似乎常被忽視，那就是，孫中山 13 歲（1879 年）時，便隨母親前往檀香山投奔其兄長、人稱“茂宜王”的孫眉。他很快送孫中山入學，先進入“高小與初中混合”的意奧蘭尼學校（Iolani School），^⑪1882 年夏畢業後，又進入中學程度的瓦胡書院（Oahu College）。可見，孫中山自幼便接受了正規的西式教育。

這種教育，對孫中山產生了深遠影響。他曾自述：“見其教法之善，遠勝吾鄉。故每課暇，輒與同國同學諸人，相談衷曲，而改良祖國、拯救同群之願，於是乎生。”^⑫這番話表明，在他看來，“就讀西校”一事，對他萌生“改良祖國”的念頭，具有重要促動作用。不過，他這裡只談到“教法之善”帶來的啟發，至於這種啟發是否促使他認識到君主專制的弊害，進而萌生反對君主制、“創建民國”的想法，則難以直接推知。^⑬

據黃宇和考證，意奧蘭尼學校是由英國傳教士韋禮士（Alfred Willis）於 1872 年創辦的一所英式寄宿學校，韋禮士兼任校監與舍監。這所學校雖然開設歷史課，但只講授英國史，“其他歷史諸如美國史都不教”；算術課中介紹錢幣，也只舉英鎊，美元“完全沾不上邊”。^⑭可見，儘管地處檀香山，但意奧蘭尼學校“英國氣”十足，孫中山很難從課堂中接受到美國政治文化的薰陶。

而瓦胡書院則截然不同。這所由美國傳教士於 1841 年創辦的男女混合中學，初衷是教育傳教士的子女，“以便他們回到美國本土升大學”。^⑮後來雖不再局限於招收傳教士子女，但其作為美國大學預備學校的性質並沒有改變。^⑯孫中山進入該校，正是為了將來赴美升學。^⑰這所學校第一年的教材裡，就有一本巴恩斯（Barnes）所著的《美國歷史》。^⑱因此，有理由相信，在瓦胡書院，孫中山有更多機會接觸美國文化。1896 年，他向英國學者介紹自己時，稱崇拜華盛頓，當非虛語。^⑲

此外，教育不僅限於課堂，孫中山受美國文化薰陶，也不限於學校。孫中山是個善於學習和思考的人。當他和母親從澳門上船，第一次看到“輪舟之奇、滄海之闊”，便有了“窮天地之想”，生出“慕西學之心”。^⑳抵達檀香山後，種種新奇的事物目不暇接，自然都會激發他的探求欲。曾擔任孫中山顧問的美國人林百克（Paul Myron Linebarger）撰有《孫逸仙傳記》，書中大部分內容來自孫中山的自述。據該書所記，孫中山到檀香山後不久便發現，當地雖然仍在夏威夷王國的統治下，卻已深受美國影響。他“覺得那裡雖還有一個擁有虛名的王，但是島上原有的居民，顯然已把政權交付了美國人了”。他意識到，夏威夷王國的進步，源於美國文化的輸入。由此，他對“美國”這個名字“很覺得可愛了”，進而“開始學習些美國的歌，並且研究些美國歷史”。這位來自東方古國的少年，很快便將美國視為“自由的國家與勇士的故鄉”。^㉑這便不難理解，為何他就讀的意奧蘭尼學校“英國氣”十足，但他在升學的時候，卻選擇了“美國氣”濃厚的瓦胡書院，以便日後赴美深造。原來，在意奧蘭尼求學的那幾年，他已通過“閱讀”社會這部“大書”，對美國產生了極大的嚮往。

還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：瓦胡書院的入學考試，範圍包括算術和美洲地理。^㉒孫中山順利通過，說明他對包括美國在內的美洲地理已有一定掌握。可以合理推測，為準備考試，他必然也做了一些有針對性的準備，從而進一步加深了對美國的了解。

綜上所述，孫中山在接受反滿革命薰陶之後三年左右，便開始受到了共和文化的薰陶。正如他聽了太平天國的故事便仰慕洪秀全一樣，他在觀察和閱讀中了解美國後，也對這個共和國產生了極大的好感。儘管後來因信仰問題與兄長發生衝突，導致他在瓦胡書院的學業被迫中斷，他也終究未能如願到美國上大學，而是於 1883 年回到故土，後又赴廣州、香港求學，但在檀香山數年中所受的美國文化薰陶，實不容輕易抹殺。

如果說，他在翠亨村私塾中聽到的太平天國故事，奠定了他“傾覆清廷”的思想基礎，那麼，他在檀香山所受的美國文化薰陶，則為他“創建民國”的思想提供了根基。當清廷在中法戰爭中“乘勝即收”的舉措令孫中山義憤填膺、促使他思考祖國前途的時候，其所受的反滿教育足以使其決志“傾覆清廷”；而其所受的共和教育，也足以使其決志在“傾覆清廷”之後，“創建民國”。

三、孫中山決志“創建民國”的社會基礎

對有些學者而言，之所以不能認可孫中山在 1885 年決志“創建民國”的說法，一個重要原因，是認為當時尚不具備提出這一設想的社會基礎。例如，林增平在論述這一問題時寫道：“就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程度而論，也還不能為造就一代民主革命家提供最起碼的條件。”^②這一判斷並不準確。從有關共和國的信息在中國傳播的情況來看，到 19 世紀 80 年代，造就一位民主革命家的“最起碼”條件實已具備。在林增平的觀點發表之後，學界關於共和國信息在近代中國傳播的研究成果日益豐富。儘管尚未有人直接從這一角度揭示孫中山在 1885 年決志“創建民國”的合理性，但這些研究無疑為探討這一問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。

關於外國的零星記載，自古以來史不絕書。但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，這些記載並未對中國的治國理念產生實質性的衝擊。這與中國的自我定位甚高有關（自居於“華夏”，視他國為“蠻夷”），也與中國自身的強大密不可分。鴉片戰爭之後，中國迅速迎來了一波空前強勁的了解西方國家的潮流。雖然在相當長的時間裡，中國人仍將西方國家稱為“夷”，但對待“夷”的態度，已悄然發生改變。此前談“夷”，總帶有一種優越感；鴉片戰爭之後談“夷”，則充滿了急迫感——迫切地想了解“夷”的內情，希望破解“夷”強盛的秘訣，並仿而效之，馴致富強。

鴉片戰爭甫一結束，魏源就編纂了一部大型外國史地著作《海國圖志》，大膽地提出了“師夷”的主張。“夷”居然有可師之處，這在當時無疑振聾發聵，石破天驚，有利於國人的思想解放。^③在最初階段，國人向“夷”學習的內容主要局限於“技”的層面。魏源所高舉的，是“師夷長技”。19 世紀 60 年代開啟的自強運動，也主要圍繞技術層面展開。但是，國人在觀察西方國家時，並非只關注“技”的層面，而是從一開始便同時注意到了“政”與“教”，即政治與思想文化的層面。並且，人們很快就發現，列強的政治制度與中國有著顯著的不同。

以《海國圖志》為例，魏源就注意到，英國有一種名為“巴黎滿”的衙門，在處理政事時居於中心地位；^④他也注意到，美國的最高統治者（“大酋”）居然並非世襲，而是每四年就要重新選舉一次。^⑤“巴黎滿”是“Parliament”（議會）的音譯，而對美國最高領導人產生方式的介紹，則涉及共和制國家的核心議題：沒有世襲君主。也就是說，《海國圖志》實際上既介紹了君主立憲國家的議會制度，也向國人展示了共和國家的總統制度。

隨著立足於國內“開眼看世界”以及走出國門親身觀察世界的人越來越多，加上來華外國人對外國情況的介紹日益增多，國人有越來越多的機會接觸到西方國家的君主立憲制與民主共和制。只要翻閱一下“走向世界叢書”，或閱讀《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》、《近代中國民主觀念之生成與流變》等著作，^⑥便可概見與憲政相關的觀念與制度在近代中國傳佈的情形。和許多論著一樣，上述著作也往往將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兩種憲政體制糅合在一起，統稱為“民主”加以介紹。但是，考慮到近代中國曾發生過君主制與共和制的激烈競爭——從這個角度看，辛亥革命正是共和制勝利、君主制落敗的關鍵事件——若將二者分開考察，或許能看到一些更有趣的面向。

首先，19 世紀 40 年代以降，君主立憲國家的情況固然在中國傳佈日廣，但中文書刊中關於民

主共和國家的信息也相當可觀。通過學界的努力,現已知道,美國憲法、法國《人權宣言》、美國獨立戰爭、法國大革命、華盛頓、拿破崙等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個共和國的信息,晚清時期均已在中國廣泛傳播。^⑧連“共和”這一觀念,也已為國人所了解,甚至在個別先鋒人物心中紮下了根。^⑨

其次,很多人在介紹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這兩種制度時,態度並無軒輊,有時甚至表現出對共和制度的高度欣賞。仍以流布最廣、影響最深的《海國圖志》為例。由於鴉片戰爭中英國是敵國,而美國曾試圖調停中英衝突,魏源對美國的印象較好。這就造成一個有趣的現象:《海國圖志》介紹英國議會制度時,行文平實;而介紹美國的總統制和議會制時,則洋溢著欣賞之情。^⑩此外,恰如學界所揭示的,林則徐、梁廷枏等士大夫在介紹美國制度時,也都是以讚美的語氣行文。^⑪

列強的治國制度如此之好,那麼,中國是否可以仿行?國人讀著魏源等人的作品,心中很容易湧出這樣的疑問。英國和中國一樣,有世襲君主;美國與中國不同,無世襲君主。二者的區別一目了然。當人們捲卷沉思時,難道都只傾慕英國的制度,而無人傾慕美國的制度?中國是一個君主制度歷時久遠的國家,在承平之世,絕大部分人都是在體制內思考問題,因此大多數人傾心於君主立憲制度是合乎情理的。但也難保有人偶爾產生傾慕共和制的念頭,儘管這種想法一定會把自己也嚇一跳。

至於如果再發生一次革命,革命者當然可能會思考:革命之後,究竟是保留君主制還是廢棄君主制更有利於國家的發展。辛亥革命之所以沒有走太平天國的老路,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革命派興起時,共和制度的相關知識已經在中國傳播了數十年,已經形成氣候。這一代的革命者,無須“天縱英明”,也很容易將共和制度作為一個選項。

回到孫中山的“決志”。即使從《海國圖志》問世算起,到1885年,與共和國相關的知識也已經在中華大地傳播了四十年左右,這足以構成造就民主革命家的“最起碼的條件”。回望那段歷史,可以看到,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,與民主共和制一同傳入中國的君主立憲制中的核心內容——議會制度,大約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,便成為很多人看好的自強方案。

例如,1883年,崔國因就提出,設立上下議院乃是“自強之關鍵”。^⑫1884年,兩廣總督張樹聲在臨終前的《遺摺》中指出,捨棄議會政治不學,而僅學習輪船、大炮、洋槍、水雷、鐵道之類,乃是“遺其體而求其用”,^⑬因此,中國應該開設議院。崔、張均是在朝官員,至於在野的王韜,則在此時期刊行的《韜園文錄外編·重民》篇中,將西方國家的立國制度分為“君主”、“民主”和“君民共主”三種,並明確主張“君民共主”的體制。^⑭他的這一分類法被廣泛接受,直至梁啟超在20世紀初年將其改為“君主專制”、“民主立憲”與“君主立憲”。^⑮可見,王韜所主張的“君民共主”,即君主立憲。

如前所述,按常理推斷,有人傾慕君主立憲制,就應該也會有人認同民主共和制;有人主張以君主立憲制為自強方案,就應該也會有人提倡以民主共和制振興國家。但為何看不到時人言論中有主張民主共和制的呢?一方面,抱持這種思想的人堪稱鳳毛麟角;另一方面,主張民主共和,即意味著對清廷統治的徹底否定,意味著謀反。因此,即便有人偶爾生出此念,也絕不會形諸筆墨,更不敢公開發表——畢竟19世紀七八十年代正值清廷所謂的“中興”時期,革命時機並不成熟。

因此,孫中山在1885年萌生“創建民國”的念頭,其實和同時期有人主張將中國建成一個“君民共主”國家一樣,毫無可怪之處。如果說,19世紀80年代以後漸次出現的君主立憲主張,是40年代以降君主立憲相關信息在中國傳播的自然結果,那麼,孫中山在1885年萌生“創建民國”的念頭,則是40年代以降民主立憲知識在中國傳播的自然結果。總而言之,都是“開眼看世界”的時風所造就。倘若說,馬克思、恩格斯在1850年所作的中國將變成一個共和國的判斷是一個大膽的預

言，^⑤那麼，三十多年後，孫中山決志“創建民國”，就顯得自然而然了。

結 語

平心而論，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，學界對孫中山“夫子自道”的質疑，無疑是“孫學”研究的一大進步。在國民黨統治時期，孫中山被尊為“國父”，被造神者們賦予了一層耀眼的神聖光環。在這一光環之下，對他的言論，只能進行闡釋、疏解，而不能懷疑。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，孫中山被請下神壇，其身份由“國父”轉變為“先行者”。在這一背景下，人們對他的“夫子自道”不再盲從，而可以大膽質疑，這顯然有利於“孫學”從“經學”走向“科學”。

不過，懷疑精神固然可貴，但有時也難免矯枉過正。有學者認為，孫中山不可能在 1885 年便決志革命，理由是此後若干年間，他所留下的文字中未見宣揚革命的言論。然而，設身處地來看，孫中山在 1885 年之後若干年沒有留下主張革命的文字，顯然是出於自我保護。儘管沒有留下宣傳革命的文字，但在實際行動上，他在 1885 年之後確實作了一些鼓吹革命的工作，這足以證明，他在 1885 年決志革命之說是可信的。

此外，孫中山決志“創建民國”，和他決志“傾覆清廷”一樣，有其思想基礎。如果說，他上私塾時從師長那裡聽聞的太平天國革命故事，已在他幼小的心靈裡播下了反清的種子，那麼，13 歲時遠赴檀香山的經歷，則使他受到了民主共和思想的薰陶。因此，當受到中法之戰結局的刺激，他不僅決志“傾覆清廷”，更決志“創建民國”。

若進一步放寬視野，不難發現，美、法兩個共和國的信息，在“師夷”風潮湧動的年代，和君主立憲國的信息一樣，已為中國的士大夫所熟悉。這兩類信息幾乎是同時傳入中國，並在國人中傳播的。這種傳播，既構成了君主立憲主張的社會土壤，也構成了民主共和主張的社會土壤。既然在 19 世紀 80 年代以後，明確主張中國實行君主立憲者日漸增多，則與此同時，有人提出將中國改造成一個共和國，也並不令人驚奇。也就是說，隨著民主共和信息在中華大地的傳播，到 19 世紀七八十年代，即使沒有孫中山，也會有如孫中山其人者出，提出在“傾覆清廷”之後，“創建民國”的主張。

①⑨黃彥主編：《孫文全集》（第 1 冊）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21 年，第 64 頁。

②當然，也有學者對孫中山的這一說法持肯定態度，其中尤以黎澍的觀點最具代表性。他在 1978 年談到：“我們從前看了這話都不大相信，現在我們從鴉片戰爭以後國內形勢發展的規律看，這個 16 歲的少年認為中法戰敗令人憤慨，有再次發動內部反抗的必要，是完全可能的。”黎澍：《重新認識歷史》，載徐宗勉、黃春生編：《黎澍集外集》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3 年，第 64 頁。此處“16 歲”屬於誤記。

③如金沖及早在 1955 年就指出，孫中山關於 1885 年“始決傾覆清廷、創建民國”的說法“是不符合事實的”。金沖及：《對於中國近代歷史分期問題的意見》，北京：《歷史研究》，1955 年第 2 期。持相似見解

者尚多，尤以李吉奎的表述引人注目，他認為孫中山此說“大言炎炎，羌無故實，莫此為甚”。《李吉奎》，載胡波主編：《鄭觀應研究口述史》（第一冊）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22 年，第 54 頁。

④如陳錫祺在 1957 年就提出，孫中山所云 1885 年“始決傾覆清廷、創建民國”雖然“還是可信的。不過他這時宣傳革命的主要目標，還是反清，建立民國的思想，還沒有正式形成”。多年後，他重申這一見解，並說“迄今尚未發現確實可信的資料證明他那時已確立共和思想”。陳錫祺：《同盟會成立前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與革命行動》，廣州：《中山大學學報》，1957 年第 1 期；陳錫祺：《關於孫中山的大學時代》，載《陳錫祺自選集》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 65 頁。持相似見解的尚有張錦貴、林家有等人。張錦

貴：《試論孫中山早期政治思想的演變》，載吳雁南、路文彩主編：《孫中山與近代中國》，烏魯木齊：新疆人民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51頁；林家有：《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道路研究》，廣州：廣東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40頁。

⑤傅斯年：《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》，廣州：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一本一分，1928年，第8頁。

⑥《林家有》，胡波主編：《孫中山研究口述史》（廣深卷中）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32頁。

⑦翁萬戈編，翁以鈞校訂：《翁同龢日記》（第6卷）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2年，第2778頁。

⑧陳寅恪：《金明館叢稿》二編，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01年，第279頁。

⑩陳錫祺：《關於孫中山的大學時代》，載吳玉章等著：《孫中山研究論文集》（上），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74~75頁。據黃宇和研究，“到了真正採取行動來推翻滿清——1895年廣州起義——的時候，楊鶴齡就拒絕參加了。”黃宇和：《三十歲前的孫中山：翠亨、檀島、香港，1866-1895》，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12年，第116頁。

⑪陳少白：《興中會革命史要》，重慶：中國文化服務社，1941年，第5頁。

⑫簡又文：《國民革命文獻叢錄》，載廣東文物展覽會：《廣東文物》（中），香港：中國文化協進會，1941年，第432頁。

⑬在回憶中，關景良還提到：“至1889年，總理的言論已充滿革命思想，要推翻清廷，廢除帝制。”簡又文：《國民革命文獻叢錄》，載廣東文物展覽會：《廣東文物》（中），第432頁。

⑭胡繩：《孫中山革命奮鬥小史》，香港：海洋書屋，1948年，第5~6頁；陳錫祺：《同盟會成立前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與革命活動》，廣州：《中山大學學報》，1957年第1期；黃彥：《孫中山早期思想的評價問題》，廣州：《學術研究》，1978年第2期；林增平：《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》，北京：《歷史研究》，1987年第1期。

⑮錢遠鎔：《孫中山早期思想發展道路問題別議——兼評“改良主義道路”論者的幾個觀點》，武漢：《武漢師範學院學報》，1982年第2期；黎澍：《孫中山上書李鴻章事蹟考辨》，北京：《歷史研究》，1988年第3

期；李時岳：《評關於孫中山早期政治思想的兩種新說》，長春：《史學集刊》，1989年第3期。

⑯陸天祥：《孫中山先生在翠亨》，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：《廣東辛亥革命史料》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438頁。

⑰孫中山本人也曾提到，幼時的這種經歷對他革命思想的形成有所影響。1900年，當宮崎寅藏問他革命思想的起源時，他答道：“我革命思想之成為體系乃是以後的事。不過引起我這種念頭的，卻是幼年時代鄉間宿老的談話。”宮崎寫道：“所謂宿老是些什麼人呢？就是太平天國的老兵。”黃彥主編：《孫文全集》（第11冊）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21年，第49~50頁。

⑱就筆者目力所及，只有房德鄰意識到孫中山在檀香山接受民主主義思想與其1885年決志“創建民國”之間有聯繫，但證據不甚有力。房德鄰：《論孫中山共和革命思想的形成》，北京：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》，1991年第5期。

⑲陳錫祺：《同盟會成立前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與革命活動》，廣州：《中山大學學報》，1957年第1期。

⑳㉓㉔㉗㉘黃宇和：《三十歲前的孫中山：翠亨、檀島、香港，1866-1895》，第221頁；第195頁；第221頁；第222頁；第221頁。

㉑黃彥主編：《孫文全集》（第10冊）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21年，第81頁。

㉒房德鄰指出，孫中山“先後就讀於英、美教會所創辦的中學，初步接觸到西方文化科學知識和民主主義思想”，但遺憾的是，他並未列出直接的證據。他進而提出，孫中山“從傾慕西方的教育、文明而產生‘改良祖國、拯救同群’的願望，這就是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”，這似乎也帶有一定的推論色彩。不過，他嘗試從孫中山在檀香山的學習經歷中探尋其共和思想源頭，這一思路值得肯定。並且，他的如下觀點亦頗平允中肯：“中法戰敗之年是1885年，孫中山時年19歲，就讀於香港皇仁書院，這時產生的共和革命思想當然還只是萌芽，但它確定了孫中山以後思想發展的基本路向，雖然不無曲折。”房德鄰：《論孫中山共和革命思想的形成》，北京：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》，1991年第5期。

②⑤郝平：《孫中山革命與美國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46頁。

②⑥“初擬在此滿業，即往美國入大書院，肄習專門之學。”黃彥主編：《孫文全集》（第2冊）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21年，第260頁。

②⑦②⑧黃彥主編：《孫文全集》（第2冊），第260頁；第259頁。

③⑩林百克：《孫逸仙傳記》，徐植仁譯，上海：三民公司，1927年，第34~35頁。

③⑪林增平：《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》，北京：《歷史研究》，1987年第1期。

③⑫章開沅：《章開沅文集》第十一卷，武漢：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199~200頁。

③⑬③⑭魏源：《海國圖志》，長沙：岳麓書社，2021年，第1404頁；第1619頁。

③⑮熊月之：《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》，上海：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，2002年；閻小波：《近代中國民主觀念之生成與流變》，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。

③⑯聶資魯：《一部憲法與一個時代——〈美國憲法〉在清末民初的傳入及對民初中國立憲的影響》，北京：《政法論壇》，2005年第5期；陳秋雲等：《美國憲法對中國近代憲政的影響及其評價》，北京：法律出版社，2011年；胡曉進：《清末民初美國憲法在中國的翻譯與傳播》，上海：《華東政法大學學報》，2015年第3期；程夢婧：《人權宣言在晚清中國的旅行》，廣西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7年；張慶：《美國獨立史知識在晚清社會的傳播研究》，武漢：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18年；顧少華：《晚清中國的“法國大革命”敘事及其思想意涵》，廣州：《學術研究》，2024年第1期；潘光哲：《華盛頓在中國——製作“國父”》，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95年；熊月之：《華盛頓形象的中國解讀及其對辛亥革命的影響》，上海：《史林》，2012年第1期；趙少峰：《拿破崙形象在中國的塑造與傳衍》，北京：《史學史研究》，2018年第4期；左勝輝：《拿破崙形象在中國的早期接受研究（1816-1911）》，北京：北京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19年。

③⑰馮天瑜：《“革命”“共和”：清民之際政治中堅概念的形成》，武漢：《武漢大學學報》，2002年第1期；郭帥鵬：《清末民初共和觀念演變研究》，四川綿陽：西

南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17年。

③⑱關於美國的制度，魏源寫道：“二十七部酋分東西二路，而公舉一大酋縱攝之，匪惟不世及，且不四載即受代，一變古今官家之局，而人心翕然，可不謂公乎！議事聽訟，選官舉賢，皆自下始，眾可可之，眾否否之，眾好好之，眾惡惡之，三佔從二，捨獨徇同，即在下預議之人亦先由公舉，可不謂周乎！”魏源：《海國圖志》，第1619頁。

④⑩夏東元：《洋務運動史》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456頁。

④⑪崔國因：《臬實子存稿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186頁。

④⑫何嗣焜：《張靖達公（樹聲）奏議》（卷八），沈雲龍主編：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》第23輯，台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68年，第559頁。

④⑬王韜：《韜園文錄外編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19~20頁。

④⑭1901年，梁啟超在《論憲法議》一文中，將政體分為君主專制政體、君主立憲政體、民主立憲政體之後，並作注曰：“三種政體，舊譯為君主、民主、君民共主，名義不合，故更定今名。”愛國者：《立憲法議》，日本橫濱：《清議報》第81冊，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廿一日發行，第1-b頁。

④⑮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寫道，中國作為“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，八年來在英國資產者大批印花布的影響下，已經處於社會變革的前夕，而這次變革，必將給這個國家的文明帶來極其重要的結果。如果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逃奔亞洲，最後到達萬里長城，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，那麼他們說不定就會看見這樣的字樣：中華共和國——自由、平等、博愛”。馬克思、恩格斯著：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七卷，中共中央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寧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59年，第256頁。

作者簡介：彭劍，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導師。武漢 430079

[責任編輯 陳志雄]